

重庆忠州城址调查

杭 侃

摘要:为配合三峡工程文物调查工作,本文作者曾于1994年调查淹没区内的古代城址。忠州城较具代表性。本文从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分析和复原忠州城址的建置、沿革和地理历史风貌、保存现状等,对三峡库区的文物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忠州 城址 调查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1)04-0017-05

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位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内,三峡工程建成后,忠州镇上的忠州古城将会遭到部分淹没。为配合三峡工程文物调查工作,笔者曾于1994年调查淹没区内的古代城址。忠州城是其中保存遗迹稍多,文献记载较为清楚的一座古城,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古代城址中具有代表性,现将调查结果简报于后。

一、忠州镇的城建概况

忠州城位于长江北岸今忠县忠州镇,忠州镇的建城历史较长。

忠县先秦时为巴国地。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载此时期忠县已经建城。巴国内乱,曼子将军求救于楚,许以三城。楚救巴,遣使请城,曼子刎首存城,忠县所建的城为三城之一,今忠州城南城墙外顺城街名“巴曼子路”,用河卵石铺就,即是纪念这位将军。

秦时忠县属巴郡,汉置临江县,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

“临江故城,今州治,汉置。《华阳国志》:临江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胸忍。梁置临江军,周置临州,唐改忠州,皆治临江。《寰宇记》:本以临江山川为名。”

今忠州城东门外一里土主庙前有著名的丁房阙。阙为仿木结构具有腰檐的重檐阙,形制较为特殊。阙左右分置,东阙尚有子阙,两阙相距2.5米,通高6.26米。丁房阙的定名,系宋人当时所见阙上镌刻有“正面汉隶十行,行三十字,强半剥落,唯汉都尉丁房五字可连读”,故名之为丁房阙。宋以来多认为是墓阙,但据辜其一生的考证,丁房阙是庙阙的可能性更大。此庙曾

名巴王庙,巴王即曼子将军,阙的年代为东汉后期,如是则丁房阙可能与汉临江有所联系^[1]。

唐贞观八年,忠县以曼子故改名忠州,忠州镇有明确的建城记载也始于唐。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他在《初到忠州赠李六》中写到:“吏人生梗都如鹿,市进荒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蹬入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2]。白诗描写的忠州城距江面落差较大(百层石蹬入州门),属典型的山地城(更无平地堪行处),是长江沿线淹没区内城址的普遍形态。白氏在忠州镇建有东、西楼等建筑,但它们至迟在明初已沦为废墟。

宋咸淳年间,忠州以度宗潜邸升咸淳府,移府治于皇华洲,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记:

“咸淳府故治:在州东四十里关溪大江中,一名皇华水,又名皇华城,俗名王化城,即《水经》之江浦也。宋咸淳元年升忠州为咸淳府,治此,故城残堞尤存”。

今皇华洲上尚存部分石砌城墙^[3]。

元代提拔咸淳府为忠州,至元二十一年改属重庆路,并将州治迁回忠州镇。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城池”条:

“忠州古巴国地,汉为临江县治,梁、周、隋、唐皆仍之,宋因度宗潜邸升为咸淳府,移治皇华洲……元至元二十一年仍复州治。”

自明代洪武初起,忠州镇的城市建设开始有较详细的文献记载。

二、忠州城现状

忠州城东门尚存,东城门为拱券结构,条石发券,城门外落差较大(图一)。忠州城北门和



图一：忠州城东门



图二：忠州城南城墙



图三：忠州城内衙署建筑

面向长江的上南门、下南门、西门城门虽已不存，但位置均可确定，四门的城名尚存，城门拆毁后形成的豁口仍然是联系城内外的主要交通通道。

忠州城城墙现存南城墙与东西城墙的各一部分。东城墙在东门附近有转折，东门向北约百米至县文管所南的一段城墙尚存，东门以南的城墙延伸至今东西向的人民路。南城墙基本保存完好，有些地段可以看出城墙直接构筑在基岩之上(图二)。但城墙上部均为现代民居所侵占。南城墙与西门以南的城墙相连，西门向北的城墙尚有10余米。瑞存的城墙均为石筑，有些地段的石块规格不一，垒砌方式也有差别，应是不同时期修补的痕迹。

与忠州城直接相关的遗迹还有学宫泮池和一处可能是衙署中建筑的清代木构。衙署建筑位于县公安局东北，现状不完整，拆除得仅余东部两间，为抬梁式木构架，大木小式做法，简洁古朴(图三)。

学宫泮池位于忠州城东二里忠州中学院内，半圆形的泮池尚存。忠州学宫明以前在忠州城北门内，与四贤阁同处一地。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四贤阁：州北门内，旧学宫。宋知州王辟之建四贤阁，谓唐刘贤、陆贽、李吉甫、白居易皆谪官于此，故以名阁，一名四贤祠。”

同卷有宋黄庭坚所撰《四贤阁记》，记绍圣三年王辟之建四贤阁事，但文中未记四贤阁本身的详细情况，其具体位置也未交待，估计四贤阁是旧学宫中的一处建筑。

同书卷五“学宫”条：“忠州学宫唐以前无考，宋绍圣年齐国王辟之知州事，始立学宫于城东北隅玉屏山麓”。同卷有《宋王辟之修夫子庙记》云：“绍圣三年余领符是邦，城郭塌废，市井凋残，民情尤为倔强……然欲使之进于道，使不尊修夫子之庙其何以广教化哉？于是捐糶粮、集乡老、观流泉、度夕阳，得之于城东北隅玉屏山麓，翕然谋始，三月事集”。

城内内屏山麓的学宫是旧学宫，洪武时学宫迁于今地。同书卷五“学宫”：“明洪武初知州王谦始迁于东门外，旧学尤崇祀”。旧学崇祀的除孔子等人外，可能还有四贤，但四贤阁至迟在清初已沦为废墟，见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二：“专城外委署：在城北门内乾隆二十年知州五尔卿格因北门设立福集场，需官弹压，于四贤阁废基建修，圯后今移往学院署左侧。”

三、忠州城的初步复原

1. 忠州城城墙的演变

忠州城位于忠州镇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小区内,城内地势北高南低,落差较大,城与江岸也有很大的高差。

忠州城南临长江,西傍鸣玉溪,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山川”：“鸣玉溪,在州西一里,……鸣玉溪两岸山势幽深……唐刺史房式于鸣玉溪架以五桥即此,又名西溪”。

城之东有东涧,同书卷二“古迹”：“东涧,在州东门外,即今严颜桥下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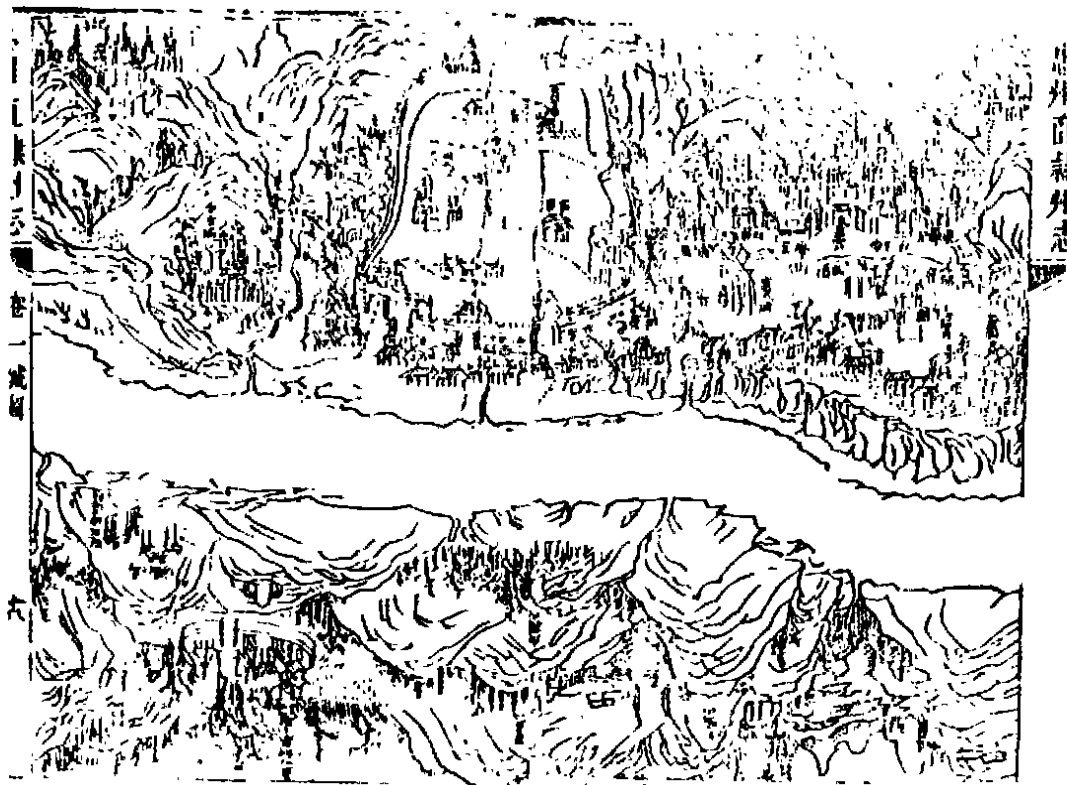
城之北隔山谷与三目山相望,同书卷一“山川”：“三目山,在州北一里,山势平远,叠亘如目者三,故曰三目”。城之座山为玉屏山,同卷：“玉屏山,在城北门内,为郡城座山……上结三目山,曲转仙女石入城”。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建置一“城池”条对忠州城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州城面江枕山,东南与西南半壁石壁峭立,高数百丈不等,西北与东北半壁以石垒之,高数十丈不等,周五里三分,共九百五十四丈。明以前无考,洪武十四年。知州王谦、守御千户陶璋修筑,天启六年知州马易从补修,为门五:上南曰听清,下面曰怀宾,西

南曰怀忠,正北曰修政,正东曰修文。国朝因其旧,然历有补修。康熙间于东北添设一门曰黄龙,城外有井甘冽,北城居民赖之,井曰黄龙,故以名。道光间于西北设一门曰金水,初名白鹤,城之外亦有井甘冽,足济州人,井名白鹤,门故以名。后知州曹廷燮更名金水,其城因山高下不一”。

查同治《忠州直隶州志》艺文志,有洪武时守御千户陶璋所撰《修城记》,记曰:

“余以洪武十二年己未岁九月,由长沙调守是邦,始至周行阅视,城隍未完,雉堞楼榭莫不倾圯败坏……于是会刺史王公子光合议檄详上宪,集事鸠工,董程勤惰无间,寒暑历二年而告竣。计修城垣三十一段,周五里四分,共九百五十四丈,其在南者高二丈,在西因地势险峻则高十丈有奇,东北则仅高一丈有奇,为门五,上南曰赋清,下南曰怀宾,西南曰怀忠,正北曰修政,正东曰修文。虽其因形势之旧,而敌楼箭楼旧已尽废,则多鼎建维新。州城自至元中改设后,前此者亦屡议修矣,然或奉行不力,或随作而随弃。今觉向之卑者崇矣,薄者厚矣,剥落者补葺矣,倾圯毁坏者重立而更筑之矣。即白太傅东、西楼诸胜,咸出之于荆棘以还其旧观。是役也,



图四: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城池图

土木之工数万,费白金四千一百有奇”。

对比两文可知,清同治年间的忠州城基本保持了洪武年间忠州城的面貌,只是其间略有补修而已,其五座城门除个别名称略有变化外,门址也相应未变。稍有变化的是康熙、道光时于东北、西北各增设一门,主要解决城内北部的缺水问题,这两座城门的设置会影响到北部的个别街道,忠州城的南部布局则未见有大的变化,道光以后编的地方志也未见有对忠州城进行较大改动的记载,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城墙和城门,应当是沿袭自洪武时期忠州城的。

那么,洪武时期的忠州城与洪武以前的忠州城有什么联系呢?

陶璋的《修城记》中已明确地交代了他“周行阅视,城隍未完,雉堞楼榭莫不倾圮败坏”,在他和王谦主持下“因其形势之旧”修葺忠州城的情况,说明洪武以前忠州镇已有古城,陶璋等人所做的工作只是重修而不是创修,共计“修城垣三十一段”,说明洪武时期的城墙是在明以前古城的基础之上重修的。从《修城记》中可以看出,元代将州治重新迁回忠州镇后,并未对此地已有的古城进行有效的修补,因此这座明以前的古城,起码应当是宋代,这和宋王辟之《修夫子庙记》所记“城郭塌废,市井凋残”,说明北宋时期忠州镇已有古城的情况相符。

王辟之为绍圣年间忠州的地方官^[4],他到任时忠州城“城郭塌废,市井凋残”,说明绍圣前忠州城已经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前引白居易诗,知唐代忠州镇已经建城,但唐代忠州城与宋代忠州城的关系已不可详考。只是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建东、西楼诸胜,陶璋撰《修城记》谓洪武时修城“即白太傅东、西楼诸胜,咸出之于荆棘以还其旧观”,估计唐代忠州城也局限在同样的地理小区内。

2. 忠州城的衙署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建署“公署”记:“知州署在城西门内。明洪武十三年知州王谦建,正统间知州王曰良重建,万历时知州尹瑜复修,明季毁于兵火。国朝康熙六年知州刘肇孔重修,库、狱具在署内。乾隆二十年知州五尔卿格添建书房”。

这说明同治时的忠州州署和洪武时州署在一个地方,都在城之西门内,今公安局东北的清代木构也在西门内,按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城池图中州署的位置在城之西南部,而这部分又无其他官署建筑,因此,这座清代木构应当是忠

州州署中的一座古建筑。

洪武时期的州署情况,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十二中王谦所撰《修忠州公署记》有所描述,记云:“洪武庚申春,予来官此土,甫下车,父老相告曰:忠州在三峡中,与万州皆为僻壤,自前元至元二十年设置州治于斯,至三十年,其城郭隍濠诸多未备,而州署更因陋就简,全未修葺。牧是邦者多欲更新之,或以戍马倥偬,或以经费无款,事多中止。今四海升平…越明年,士民见予治事于荒庭茂草间,复相率切诚输将以请。予曰:“是可以役我民也。于是卜日鸠工,倾圮者新之,剥落弗甦者举正之,规模险隘者式廓之,其中为大堂…是役也,始于九月乙己,成于十二月己卯,不十旬而官有堂、吏有舍”。

从王谦这篇《修忠州公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洪武时王谦重修忠州公署“倾圮者新之,剥落弗甦者举正之,规模狭隘者式廓之”,占有的是原来元代忠州公署的地方,王谦之后,忠州公署虽有修葺,但地址未变。王谦文中还指出元代州治自至元时迁回忠州镇之后,“其城郭隍濠诸多未备,而州署更因陋就简,全未修葺”,王谦来忠州之初,尚“治事于荒庭茂草间”,即是说忠州州治自黄华州迁回后,终元一代未加修葺,沿用的是宋代感淳前的州署,咸淳元年是1265年,洪武元年是1368年,在百余年时间中州署中的木构建筑“全未修葺”,这话可能会有一些水分,但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修葺,恐也是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宋代的忠州州署与元、明、清的忠州的州署就在同一个地方,均位于城之西南部。

忠州州署选在西门内可能是考虑到交通便利。道光《忠州直隶州》卷一:“神溪渡,在城西南岸,为由州至石柱、施南大道。乾隆十五年署州刺史张凤诰设有神溪渡义田”。同卷《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忠州城之西南有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

3. 忠州城内的街道

同治《忠州直隶州》卷二“街市”条记载了忠州城的街道情况,其中位于城内的有“十字街在上南门内”、“折桂桥(街)在下南门内”。“丁子街在十字街上,福集场街在北门内”“杨柳街在福集场右,节孝总坊街在杨柳街右”,“莲花池在东门外,棚厂街在莲花池右”。“西门正街在西门内”。

道光《忠州直隶州》城池图中绘有街道示意图(图四),图中绘出康熙间新设的东北门及东北门内的东西街道,但未绘出道光间新设的西

北门,而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城池图与道光《忠州直隶州》城池图相同,说明同治修志时并未新作城池图。如前所述,洪武时期忠州城为五门,这五座城门的位置可以确定。五座城门分别应当有街道相通,结合今天的地形图与道光时的城池图,古今街道相印证,可以确认的古街道有:

西门正街:即人民路的一部分,东西向。

十字街:南北向,上南门向北与西门正街相交而成十字街,今仍叫十字街。

折桂桥街:下面门向北延伸至福集场街,即今体育路。

棚厂街:东门内的东西向街道,今东坡路在城内的一部分。

丁字街:东西向,连接南北向的十字街与折桂桥街。

福集场街:北门内,与折桂桥街相连,即今北门路,福集场为乾隆二十年新设,明代有此街,但不应叫福集场街。

杨柳街:即北山路在北门路西的部分。

节孝总坊街:即杨柳街向南延伸的部分。

若根据忠州城内街道布局,衙署位置,是可以作出洪武时期忠州城的复原参考图的。

四、结语

1. 忠州城构筑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小区内,防御上有有利的一面。城内外均有较大的落差。建筑上因山而筑,缘山为墉,平面形状不规则,街道也有弯曲,城门的设置偏重于南部,西门的位置尤其如此,这与当地的交通有关。忠州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赖长江,城门位置偏南即地近长江。忠州城衙署位于城之西南部,选址也与神溪渡有关。这种情况在淹没区内具有代表性,涪州、巫山、归州等城与之相似,是这一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址类型。

2. 忠州城城墙自宋以来历代相沿,以及元代沿用宋代州署,与地形和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有关。

忠州在古代生产力较为落后,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曾记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建造城池是一件十分耗费民力的事,经济上的落后,必然会影响到城市建设的发展。

四川在蒙元与南宋的战争期间饱受蹂躏,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摧残。据明代王维贤《九贤祠记》:"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

之。蜀人如余、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只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5]。川峡地区是这场战争中争夺的一个焦点,情况很难比其他地区好到哪里去,川峡地区生产力的逐步恢复,则已到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之后了,所以忠州城和州署发展变化缓慢就在情理之中了。

宋咸淳年间忠州迁治皇华州,今忠州镇一带不是战争热点,所以一些建筑得以保存,元代沿用咸淳前的宋代忠州州署,可能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

3.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忠州城要想扩大城墙范围受到阻碍。明清忠州城的一些机构如学宫、文昌宫、都司署等建于东门外,可能与此有关。但是,也应注意,山地城与平地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地势过高,存在着交通不利、取水不易的困难,故衙署选位在西南也有这种考虑在内。今沿江城市沿江一面的古城墙外居民均有不少,这是因为发生洪水的年份毕竟不多,而近江日常生活有很大便利,这种情况在古代一样如此。忠州城沿山脊修筑,主要是出于防御上的考虑,城之北部在宋代尚为空旷,宋之学宫即选址在城之北门内空旷地,一来学宫选址在清净地,二来单仅学宫用水有限,这种情况与山西武乡县的情况相似^[7],说明山地城之间有一定的共性。

注释:

[1]辜其一、陈振声:《四川忠县汉阙纪略》,《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文物出版社 1981年。

[2]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十八,中华书局 1979年。

[3]皇华城的北城墙尚保留下来一部分,城墙石砌,城内因解放后当地居民挖土淘金,遗迹破坏严重。

[4]王辟之,字圣涂,山东临淄人,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四年从忠州任上告老还乡,著有《澠水燕谈录》十卷。

[5]光绪《潼川府志》卷五。

[6]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七“政绩”记:“马,宕昌人。德二年以六郡镇抚使守咸淳府,是年,元兵据重庆,达州降将鲜汝忠攻城,杨文字与同里,开谕之,使降,不从,既而城陷,悉力巷战,力屈就擒,死之”,此事亦见于《元史》卷 161《杨文安传》,由此可见南宋末咸淳府一带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

[7]民国《武乡县志》卷三“营建考”。

(作者单位:上海市博物馆)

(责任编辑:蒋学松)